

# 热话题、强情节与现实的映照

——评电影《孤注一掷》

刘海波

电影《孤注一掷》在8月初本来只是想做一点点映。点映是近年来电影宣发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在少数影院面向媒体、影评人和影迷的放映，了解观众的实际观影感受，测算影片的市场预期，为影片的全面上映制定性价比高的宣发策略。同时也希望获得影片的好口碑，并由这些意见领袖实现影片的口碑传播。

没想到这部影片在点映阶段反响热烈，片方干脆提档放映，目前可以说是各大影院排片量最多、上座率最高的影片。当然，影片提档，在一部分人看来会形成对在档影片的挤压，相当于胃口好的人提前入席了别人的蛋糕，也引起了业界的争议。

《孤注一掷》的火爆，首先得益于题材的高关注度。境外电信和互联网诈骗，近些年来愈演愈烈，无数受害者被骗得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已经成为波及面广、危害极大的社会毒瘤。用手机和网络，几乎没有没人没收到过诈骗短信或电话，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犯罪分子花样翻新、套路复杂、招损迭出，不仅利用高科技，使用机器人广泛撒网、使用大数据精准筛选，还越来越倾向于假扮公检法、海关、税务、移民局等国家执法机关，利用这些部门的权威性来对受害者进行恐吓和诱骗，不仅更容易让受害者上当受骗，还严重损害了国家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有些侥幸从诈骗工厂逃出的受害者的亲身口述、部分媒体人的卧底调查，更拉高了公众的恐慌和关注。公众急切地了解犯罪的内幕以缓解焦虑，想从执法部门对犯罪集团的痛快打击中获得安全感。在这种社会情绪和期待中，第一部正面展现电信网络诈骗内幕的《孤注一掷》上映，可以说踩准了观众那根敏感的神经，呼应了社会热烈酝酿的情绪，火爆是顺理成章的。

从宣发上说，《孤注一掷》充分利用了近年来传播力最强的短视频平台，不仅宣传视频被广泛传播，许多看过影片的博主，也自发加入了讨论该片的队伍。由于这一话题的高关注度，短视频博主在推高影片热度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高流量，实现与影片宣发的双赢，自然都会成为影片宣传的自来水。

题材的高话题度只是影片火爆的基础，其本身采取惊险片的类型，以高对抗和高悬念实现强烈的戏剧性，紧紧抓住观众才是票房成功的根本原因。影片以张艺兴饰演的程序员潘生、金晨饰演的模特梁安娜被骗到海外进入诈骗工厂后的逃生之路为主线。在人生地不熟的异邦，不仅诈骗工厂内部戒备森严，看守荷枪实弹，老板残酷冷血，即便跑到大街上也会被串通一气的黑警和利益捆绑的当地人送回工厂，逃脱几乎不可能。从戏的角度说，障碍越大，对抗越强烈，悬念也就越高。所以潘生与梁安娜一次次逃跑和报警的努力变得格外惊险，最终还是靠中外警方合力捣毁了诈骗工厂，潘生才得以解救。

但是为了让故事好看而塑造的强大反派，给逃脱增加难度而设置的重重障碍，也为故事的进展提出了难题，给影片留下了漏洞。

《孤注一掷》中警方之所以能一举捣毁诈骗工厂，关键人物是逃脱出来的梁安娜。这一点引发了很多观众的质疑：现实中，像梁安娜这么柔弱的女受害人怎么可能安然逃生？这就好像魔术师，前面的惊险对抗像抖包袱，最终如何逃脱是魔术师给观众交的底，可若是这个底太随意，便难以说服观众。像梁安娜这样被骗到境外诈骗集团里并深度参与了犯罪的漂亮女孩，如果不同流合污任由摆布，要么就会像影片中展现的那样，被沉到海里，要么就像许多短视频里拍到的，被一再蹂躏折磨后变成一个异国街头的疯女人。而影片为了让

是前我们对境外诈骗犯罪的反击手段也仍然有限，部分邻国政局动荡，影响了国际执法合作，让我们无法彻底清除毒瘤。有观众抱怨影片中咏梅饰演的反诈支队队长赵东冉招数不多，形象拘谨，没有“战狼”式的痛快，正是无奈现实的反映。影片中我公安人员即便有邻国移民局的配合，跨境执法仍然遭到当地黑警通风报信、被煽动的村民暴力来围堵，生命遇到威胁，可想而知，境外反诈执法何等艰难。片尾，在公安机关组织的反诈宣传现场，那个坐在最后排手里拿着诈骗工厂筹码的神秘人物告诉我们，执法与犯罪之间的较量还将长期延续。

在跨境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受限的情况下，警方只有先从加大反诈宣传、提高中国公民的防范意识，与银行合作、切断被骗资金转移链等国内可操作的环节入手。近年来，我们也不断在媒体上见到相关报道，在生活中接触到反诈宣传，在手机上安装反诈App。而制作电影《孤注一掷》

显然也是反诈宣传的重要一步。影片的宣传海报上，明确写着“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凸显了影片的教育警示目的。从当前火爆的观影趋势看，这部商业电影的反诈效果，可能比以往的任何宣传都要给力，是“寓教于乐”原则的最好体现。

《孤注一掷》极有可能复制2018年《我不是药神》在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现实上的巨大功效。电影界应该受到启发，重视现实题材特别是现实问题题材影片创作，找到与观众的共鸣点，在实现艺术娱乐大众的同时，获得推动社会进步的额外功效。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梁安娜能够死里逃生，安排了一直心狠手辣的诈骗团伙小头目阿才因为单相思的爱慕大发善心，冒着被老板发现的危险，偷偷从海里救起了梁安娜，还把护照还给了她，并安排了一艘渔船把她送走。这个剧情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反而成为槽点，因为从人物性格塑造来看，阿才一贯心狠手辣；从人物行为逻辑来看，如果阿才有意保护梁安娜，之前就不会在意识到有求救号码的代币与梁安娜有关还报告陆经理，横生枝节。更何况，偷出护照、买通渔民等手段，如何能够轻易瞒得过更狡猾的陆经理？影片之所以留下这些漏洞，没有拿出令观众信服的弱女子逃出生天的妙招，既是编剧能力有限，也是现实生活没有提供太多成功逃脱的案例所致。现

实是前我们对境外诈骗犯罪的反击手段也仍然有限，部分邻国政局动荡，影响了国际执法合作，让我们无法彻底清除毒瘤。有观众抱怨影片中咏梅饰演的反诈支队队长赵东冉招数不多，形象拘谨，没有“战狼”式的痛快，正是无奈现实的反映。影片中我公安人员即便有邻国移民局的配合，跨境执法仍然遭到当地黑警通风报信、被煽动的村民暴力来围堵，生命遇到威胁，可想而知，境外反诈执法何等艰难。片尾，在公安机关组织的反诈宣传现场，那个坐在最后排手里拿着诈骗工厂筹码的神秘人物告诉我们，执法与犯罪之间的较量还将长期延续。

在跨境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受限的情况下，警方只有先从加大反诈宣传、提高中国公民的防范意识，与银行合作、切断被骗资金转移链等国内可操作的环节入手。近年来，我们也不断在媒体上见到相关报道，在生活中接触到反诈宣传，在手机上安装反诈App。而制作电影《孤注一掷》

显然也是反诈宣传的重要一步。影片的宣传海报上，明确写着“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凸显了影片的教育警示目的。从当前火爆的观影趋势看，这部商业电影的反诈效果，可能比以往的任何宣传都要给力，是“寓教于乐”原则的最好体现。

《孤注一掷》极有可能复制2018年《我不是药神》在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现实上的巨大功效。电影界应该受到启发，重视现实题材特别是现实问题题材影片创作，找到与观众的共鸣点，在实现艺术娱乐大众的同时，获得推动社会进步的额外功效。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 家庭叙事干扰了类型表达

——评谍战剧《潜行者》

马伦鹏

尽管电视剧《潜行者》从名称上就标明了自己的谍战剧身份，但其最主要的叙事焦点并不是在烧脑的反间情节，也并非匪底的忍辱负重，而是在孤岛时期（1937—1941）上海暗流汹涌的社会大背景下，以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基础展开的人物个性与革命任务。

可以说，《潜行者》在谍战剧经典《潜伏》《风筝》《叛逆者》等之后开启了新的“家庭叙事”结构，在斗智斗勇对抗的审美疲劳下，加入了“家庭斗争”模式。这种新的尝试显然吸引了“合家欢”观众，但也不可避免削弱了谍战剧核心的类型要素，冲淡了应有的快节奏、强刺激、重反转的观剧期待。此外，虽然加入了重磅家庭戏，但在女主设置、儿童角色、文化表征上还是沿袭套路，鲜有突破。

成也“家庭”，败亦“家庭”

“杜鹃啼血，饮冰前行”。潜行者从来不是一个秘密的符号，而是极端斗争环境下刀尖行走的绝命者。在《潜行者》这部剧中，主线就是1941年我党地下工作者“杜鹃”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以情报处副处长方嘉树的身份周旋在日本、汪伪、国民党之间，为了信仰而战，为了国家而战。

三栖特工，危机四伏。“杜鹃”方嘉树其实有三重身份，为三面间谍，既是76号的情报处副处长，又是国民党军统银狐小组的队员，终极身份是代号为“杜鹃”的共产党员。按理说，这么一个身兼多职的角色应该如履薄冰，绷紧的弦一刻不放松。但黄晓明饰演的杜鹃却显得过于轻松，很多时候还带着其综艺中标志性的咧嘴笑。也难怪，毕竟他在剧中大部分的压力不是来自谍战与潜伏，精力都耗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矛盾上。

方嘉树不仅一举一动都在多方势力的监视下，还面临四面楚歌的亲朋之间的联系——湖北老家忽然出现的前妻陶玉玲，她现在不仅是我党联络人，要和方嘉树假扮夫妻，还与地下党上级老赵成了未婚夫妇；与陶玉玲一起来的还有她与方嘉树的儿子方子睿，老赵与前妻的女儿乐言；方嘉树在76号的顶头上司、情报处处长叶兴城，陷入了和方嘉树、苏雅露的三角恋；苏雅露是军统



派出潜伏76号的，她深爱方，却不得不和叶兴城暧昧，期望策反这个情痴；任人唯亲的76号幕后大Boss李力行，这个老狐狸和叶兴城是连襟，对方嘉树不仅有工作怀疑，更因祖护家人对方嘉树天然排斥；陶玉玲随后能执行任务成功，不是因为认识别人老婆，就是借故上门讨债。几乎所有的工作关系、革命斗争都转换成了家庭矛盾。能想象到的家庭内部的一地鸡毛，包括二婚组合、孩子上学、情人上门等都成了推动情节的重要元素，也变成了潜伏任务的重要解决方案。

所以，剧中谍战的敌我生死搏斗被置换成了家庭中的关系维持和情感调和。而家庭线的幽默琐碎，家长里短，则带来该剧风格上的变化。第二集方嘉树就“喜当爹”，随后又陷入各种三角关系；方嘉树、陶玉玲、老赵的家庭三角关系；方嘉树、叶兴城、苏雅露的恋爱三角关系；方嘉树、叶兴城、李力行的工作三角关系。叶兴城知道方嘉树的小名叫六子，于是给自己的小狗取名叫六子。方嘉树和“小三”苏雅露私聊，打趣“情人约会，不要骂原配”等等，不按套路出牌的家庭情感与经典谍战气氛构成了巨大反差。

这种创新安排一开始的确让人眼睛一亮，观剧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提心吊胆，关键时刻总有“家人”协助，但随着剧情不断深化，谍战的斗智斗勇几乎都被化解得悄无声息，该有的紧张刺激和国家大义成了某种“合家欢”。《潜行者》本身对于家庭戏是既爱又恨的，一边反复强调“干革命要切断所有社会关系”，

如苏雅露所言“危机环伺，身边不留亲人”，结果又是如李力行形容方嘉树的“私事特别复杂”，这显然是最大讽刺。

其实，《潜行者》中以家庭戏切入谍战剧并非首创，此前我们在《潜伏》中也看到过假夫妻、真同志的模式。但该剧加入太多枝枝蔓蔓的情人、孩子、连襟和叔嫂关系，冲淡主线，情感上也失去了像更经典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芬之间的相濡以沫、相互配合、革命爱情贯穿抗日和解放战争。

因为家庭这条线的喧宾夺主，众多角色陷入“清官难断家务事”泥潭，不是蜕变为“恋爱脑”，就是忽然“降智法”，造成了太多情节漏洞和情感虚伪。比如叶兴城每次都能发现方嘉树的疑点，这不是靠职业素养，更不是凭坚定信仰，完全靠着恋爱中的嫉妒与敏感。叶兴城为了避免嫌疑，他都必须脸蛋和胸口各开一枪，非常谨慎而阴森的反派。可他一转身就变成了多巴胺的牺牲品，理智丧失，判断全无。他一开始就猜对了方嘉树是“杜鹃”，不是聪明，而是吃醋，爱情的力量真是“强大”。

谍战剧中的家庭该怎么演？

家庭纠结，身份多重，人物勾连，应该是谍战影视的加分项。革命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也必然在家国风雨、社会关系中得以历练，看清真理，坚持信仰。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小说、电影都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尽管早在1996年就开始写作，也确实曾借早期如《红旗下的男儿》这样的作品获得过“小王朔”“后顾主”这样的称号，但决定石一枫成为一个以书写无限跃动的当下，且用一系列精彩的人物形象、故事等表达对于现实的反思为鲜明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却是2014年发表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其次，通过弱者之间的共情，将对于当下现实的省察推向深入。弱者本身负载了巨大的时代讯息，负载不同时代讯息的弱者互相碰撞后的共情，就成了石一枫小说最为让人动容的部分，也就此将一种批判性省察表现得更加透彻。《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与邱晓芬这两个社会底层的弱者，在信仰与10万元钱之间备受波折后，终于艰难取得和解。她们无疑是彻底的弱者，又构成了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恰恰是二者的冲突促成了二者精神的敞亮和互相拥抱，构成了动人的姐妹情谊，揭示了更多的社会批判内容。而“我”作为小说叙述人，在插科打诨玩世不恭之中突然的灵感发现，总是构成“我”与小说主人公（如《逍遥仙儿》中的王大莲、《入魂枪》中的张京伟等）之间最为动人现实的联结。在社会现实面前，弱者的共情无疑仅具有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但正是这种精神性的力量能够洞穿现实，达成对于现实的省思。

最后，弱者诉说着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那些不变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在一个传统价值备受冲击的时代里，弱者通过自身言行不时擦拭着那些在现代化浪潮里或遭冷待的传统价值，使其继续发光。“在没有道德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人为了道德而疼痛呢……”这是《地球之眼》中安小男的自我疑问，这个一生都纠缠于道德问题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巨大的道德危机，因为对道德问题的不容忍而至于人生荒漠。但安小男以其悲剧命运却促使我们严肃思考以下问题：我的生活是否道德？我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听到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安小男复活了“道德”这个词，赋予“道德”这个传统价值以再度坚定的积极意涵。道德之外，石一枫笔下的弱者也让读者再度坚定对于信仰、正义、战斗、善良、奉献等传统价值的信赖。在《漂洋过海来送你》里，那豆等人凭借着自身的奉献精神 and 职业精神，无疑都散发着耀眼的人性之光。而在对于这些传统价值的代际传承的叙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如诚实、善良等）作为一个整体也就被一定程度上激活，成为指引当代人的精神与价值光源。

无疑，凭借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石一枫将对于当下现实的表现与对于当下现实的省察有机结合在一起，正在成为书写现实，表现时代和社会最新变化的渐成气象的当代作家，也就此出示了当代文学的一种可能。鉴于其近年来创作的丰硕表现来看，的确可以认为在他的笔下，现实熠熠生辉。

也应该看到，当一种写作路趋于固定时，僵化与问题也就在所难免。目前来看，石一枫的创作亟待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下现实典型性塑造还不够充分。除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麦子店或许可称为新时代的一处典型环境，石一枫的小说还缺乏其他鲜明独特的典型环境塑造。其小说的重心在于人物塑造，偏重于呈现“现实的冲击”对于人物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对应于典型环境的塑造。二是在人物塑造上，其小说明显偏重弱者的塑造，从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他人的塑造。比如小说对于弱者的对立面——强者的表现，就时弱显得潦草、简单、近乎脸谱化。与弱者形象的闪光相较，强者形象缺乏应有的、对等的表现力度，也就部分消解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这一问题在《逍遥仙儿》中有一定改观，作为王大莲的对立面，苏雅露也被塑造得相对饱满，但未来这方面仍可加强。

首先，弱者最能诠释时代变迁和现实变动。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最先受到波及的总是弱者，因此弱者是揭示时代秘密和现实问题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入魂枪》里的两个“瓦西里”——沉迷于网络游戏里的自闭症患者——就成为当前社会剧烈变革下的参照物。他们因为自身的“无能”，而只能在游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超越现实之中的“无能”，又最终不得不沦落到社会边缘的命运轨迹，一方面反映出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发展中存在的时代精神问题亟待正视。与“瓦西里”一道，王大莲《逍遥仙儿》、那豆《漂洋过海来送你》、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 怎样书写能让无限跃动的当下煜煜生辉

——从石一枫的写作说起  
龚自强